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對中國大陸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在面對中國大陸以政治、經濟與武力威脅，並不時主張對台擁有主權的台灣而言，實在很難脫離「顯學」的地位；也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威脅一直存在著，兩岸關係與台灣的生存就不得不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對中國大陸問題的研究，以兩岸關係作為研究結果的呈現，就成為學者所熱中的項目之一。

台海兩岸國共鬥爭所留下的政治體制，迄今大部分時期分別由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掌握，大陸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基本上被認為是極權主義、集權主義、威權主義的統治模式，大陸雖然經歷了毛澤東、華國鋒、鄧小平到江澤民等幾任領導人，但國家體制上仍不脫離極權、集權、威權體制的範疇，對台灣的態度，雖在不同領導人時代有些許轉變，如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血洗台灣」，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甚至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在一九八二年憲法中明白規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份」等等的轉變，¹卻始終維持對台灣主張主權，並向國際社會宣告台灣是其未平伏的一省，中共的這些主張也早已獲得國際社會大多數國家的認可；而台灣自一九八八年李登輝依據憲法接替蔣經國為國家元首以來，就逐步推動台灣的民主化，在經歷終止戡亂、修憲及總統直選以後，李登輝及在公元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中獲勝的陳水扁都宣稱，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或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的名字叫做「中華民國」，隱然將「台灣獨立於大陸之外」的宣示作為渠等獲取政權，或強固政權的圖騰。

¹ 法務部調查局編印，中共現行法律彙編（台北：法務部調查局，1989），頁2。

台灣從荷蘭人時代開始，經過鄭成功時期、日本人統治及中華民國政府時期，與大陸都呈現長時期的對抗局勢，鄭氏王朝降清，清朝統治主導的前半期，清政府甚至以防止叛亂等理由設法管制兩岸人民之間的往來。²

從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氏王朝、海盜、清朝、日本人到國民政府，更大體以製造台灣與大陸的分離，來做為控制台灣的基礎，³因此，由古迄今兩岸關係或許可用「對抗為常態」加以形容。

Alan M. Wachman 認為，自二次大戰結束，台灣光復以來，台灣人民經常普遍表現與大陸格格不入的國家認同，深究其主要原因是：⁴

1. 台灣早與大陸分離，集體的記憶是外來武力強加於台灣人民身上。
2. 台灣人民與國民黨的磨擦，起源於台灣人民與國民黨早期的衝突與錯誤認知。
3. 台灣文化與台灣意識不同於中國文化與中國意識。
4. 大陸人以凌駕統治方式攫取台灣人的利益，並強迫台灣人再變回(re-socialize)中國人，使得雙方的認知更加分歧。

而在近期民主化的過程中，由蔣經國時代的追求統一，到李登輝時代的「台灣優先」及民進黨、建國黨的有意無意操作下，台灣人民被迫跟隨不同主政者對國家認同做出激烈轉變，並承受強烈衝擊。毫無疑問的，國家認同是形成一個國家的心理要素，也是一個國家政治教化所強調的主要內涵，因此，在存在而且統一的國家來說，人民的國家認同乃是一種假定或原始的信念，不會將國家認同作為社會的議題，或政治動員的焦點，反之，若將國家認同作為社會的議題或政治動員的焦點時，

² 石之瑜，*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台北：正中，1993），頁 226。

³ Alan M. Wachman, *Taiwan :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1994), p. 93.

⁴ Wachman, *Taiwan :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pp. 91~92.

這個國家的認同就出現了危機，⁵部分台灣住民的國家認同懷疑，在民主化後更形激烈，顯見國家認同在台灣政治環境中的危機。

台灣往後的走向不外是與大陸統一或獨立成一個國家，當前的狀態是呈現在國際間以主權獨立國家自許，在兩岸間又不得不以「對等政治實體」自許的尷尬局面，⁶有學者以「半國家」(intermediate state)來加以形容，⁷而台灣未來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台灣大多數民眾對國家認同的走向，進一步的說明是，對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台灣不僅是不可奪走的中國的一部份，更是一世紀來面對列強壓迫鬥爭以恢復中國國際地位未完成的象徵，任何想支持台灣自中國分離出去的行為，就是直接傷害這種感情，而任何支持台灣獨立的中國領導人，也將被大多數的中國人所唾棄；⁸在理論層面上，穩定的政治環境是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在實際層面上，中國自清朝、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視台灣的分離具有高度政治不穩定的象徵，「收復」台灣更是專制政權合法性基礎，⁹以中共的立場看，台灣問題的解決更是中共反帝反霸政策的重要任務，¹⁰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決心以任何方式「收復」或「併吞」台灣的企圖，在政權合法性的考量下，在可見的未來絕不會輕易改變，但台灣對於國家的定位及屬性卻因國家認同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本論文假

⁵ 徐火炎，「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間的時政研究結果」，台灣族群政治專題（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台北：月旦，1996），頁 90。

⁶ Christopher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52.

⁷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p. 129.

⁸ Quingguo Jia, "The Making of Beijing's Taiwan Policy",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 Samuel S. 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Colorado: Lynne Rin, 1995), pp. 100~101.

⁹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pp. 19~20.

¹⁰ Chih-yu Shih, "The Reluctant Dragon: Taiwan as a Psychological Factor in Mainland China's U.S. Policy",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 Samuel S. 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pp. 182~182.

設中共對台態度不變而台灣國家認同不斷改變的情況下，必然會建構出不一樣的兩岸關係，依此推論，若能建構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對於兩岸關係的因果關係，必將有助於兩岸關係研究理論的發展，這就成為本文的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兩岸關係的研究已到汗牛充棟的地步，但對兩岸關係理論的建立卻明顯不足，¹¹這個不足對於已有的兩岸關係研究成果，常構成諸多不周延之處，常被學者提及。

本論文將集中探討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轉變對兩岸的影響，並意圖從中補充現有兩岸關係的各類理論，讓各家理論在解釋、描繪與預測兩岸關係過程中，多加考慮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的主流意向，使得兩岸關係的相關理論因而更加周延與完備。希望能就建構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對兩岸關係影響的研究途徑（*approach*），甚至進一步建立國家認同變遷對兩岸關係影響的理論有所貢獻。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對於兩岸關係及國家認同的文獻回顧，可分為國內與國外兩大部分加以探討。

學者對於兩岸關係研究途徑（*approach*）分為五大類：¹²

一、外交史途徑（*the diplomatic history approach*）

以兩岸重大的外交事件為研究的內容與分析的對象，作為研究兩岸關係變化的依據，如：Thomas Stolper、Stephen Gilbert、William Carpenter、

¹¹ 包宗和、吳玉山等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1999），頁序 1。

¹² Tun-jen Cheng, "The Mainland China-Taiwan Dyad as a Research Program",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Samuel S. G. Wu, ed.,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pp. 5~13.

Yu San Wang、John Copper、明居正、冷則剛、袁易等人的相關研究便是。
例如：

明居正依據 Kenneth Waltz 的國際體系理論作為出發點，考察一九九一年蘇聯及東歐共產政權崩潰後對國際體系帶來的衝擊，並由此分析推論亞洲局勢及兩岸關係，認為，在蘇聯及東歐解體之後，世界局勢形成一個以美、歐、俄、日及中共所組成的「一霸四強」格局，所謂一霸，當然是指美國，其他則是四強。

明居正認為各國都在爭取下個世紀更佳戰略地位，所以各國的關係是「既合作又競爭」，在此格局下，未來亞洲會呈現幾種特色：美國依然會留駐亞洲，並保有極大的影響力；中共及日本已心照不宣的進入大對抗；美國重申美日安保條約關係，但因性質轉變而具有多面向意涵；中共未來努力的方向是壓迫日本取悅美國，以削弱美日安保條約之影響等。美國一方面壓迫中共加入國際體系，迫使中共和平演變，一方面又大打台灣牌，以逼迫中共合作，在此大格局下，台灣的戰略、外交與大陸政策的迴旋空間有限，台灣僅能在此格局中努力爭取較有利的地位而已。¹³而台灣在外交作為及與國際大國間的關係，也不斷的在此國際大環境中起落，同時彰顯兩岸關係的不斷衝突與轉折。

冷則剛雖以「國家社會」途徑研究兩岸關係，強調國家與社會相互影響後，發展出特定大陸政策，¹⁴但其論述也無法將兩岸關係的發展與運作，完全脫離國際體系理論中台灣與各國家間外交折衝的架構進行，因此筆者將冷則剛的研究途徑，歸類為外交史途徑加以理解。而民進黨重

¹³ 請參閱明居正，國際體系變遷（台北：五南，1992）；「美日安保宣言與我國外交空間」，開拓外交空間：1996年我國外交之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論文（嘉義：中正大學，1996）；「美國、中共與日本的戰略關係與台海風雲」，許光泰編，香港回歸與大陸變局（台北：國關中心，1997）；「中華民國之戰略環境與東亞集體安全」，許慶復編，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台北：正中，1994）；「國際新情勢下我國外交走向」，蔡政文編，1997台灣新契機（台北：國家發展基金會，1995）；「國際體系理論與兩岸關係」，包宗和等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1999）等等。

¹⁴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頁 19~20。

要智囊立委林濁水，亦擅長用此途徑看待兩岸關係。¹⁵袁易則認為應瞭解台灣在現有國際體系中的表現加以創新與變化，才足夠建構兩岸關係研究途徑。¹⁶

二、分裂國家途徑（the divided nation approach）

以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的分裂與互動關係，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研究參考架構。如：包宗和、Gary Klintworth、Hai-huan Chu、蔡政文、張五岳、吳東野、魏艾、沈清松等人所做的研究。例如：

張五岳就以描繪的方式，詳盡描寫東、西德與南、北韓兩個分裂國家，在追求統一的過程中，所做的決策與推動結果，其中，東、西德兩個國家，在人民與政府共同努力下，終於達成統一的目標，而南、北韓卻是兩個政府在表面上皆極力接觸與推動交流，私下卻一再以各種法令限制人民互動（動輒以違反國家安全罪論處），使得推動多年的統一工作仍無重大進展。

分裂國家再統一的經驗中，西德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放棄「赫爾斯坦原則」，大力推動「東進政策」，東德亦不再堅持「烏布列希特主義」，使得兩德在外交上放棄「漢賊不兩立」的堅持，開始平等對待是兩德得以統一的關鍵，這種轉變使兩德政府能平等的在國際間及兩德政府間密切的進行交往，同時也進一步促成了兩德人民間的頻繁交流，兩方面的共同努力，才達成統一的局面；南、北韓則在一九七〇年代進行政府間的會談，至今雖已進至總理級的會談，但兩韓人民卻因兩韓政府各自對其人民設立防止「通敵」的法律，不允許通郵、通電、互訪、甚至任何形式的文化互動與交流，¹⁷故至今仍無統一曙光出現，台海兩岸的情況卻

¹⁵ 請參閱：林濁水，「從冷戰和全球化架構下的美國台海政策：從克林頓到小布希對一中典範動搖的因應」，張貼於：<http://www.inpr.org.tw/inpre/pub/journals/m1/,19-1.PDF>

¹⁶ 包宗和、吳玉山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頁 31。

¹⁷ 張五岳，分裂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業強出版社，1992），頁 365～

是人民自始交流密切，兩岸政府在八〇年代以前雖是各說各話，相互統戰，到八〇年代以後雙方開始進行積極作為，¹⁸但自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問康乃爾，及一九九六年因台灣總統大選所引起的台海危機後，兩岸政府交流幾乎停頓，到二〇〇〇年台灣總統大選發生政黨輪替，由主張台獨的陳水扁繼任，二〇〇四年陳水扁連任，兩岸的交流更加難以實現，在這種情勢下，兩岸不僅毫無即將統一之跡象，連最起碼的海基、海協兩會半官方交流都已全面停頓。

張五岳由兩國統一的經驗與教訓，檢視兩岸間目前經濟熱絡，政治分歧的狀況，並總結兩岸關係特徵是：

（一）、經濟熱絡、政治尖銳對抗。

（二）、既欠缺官方直接對話管道，亦無法透過中介機構建立起制度化協商途徑。

張五岳同時建議，兩岸必須放棄過時的主權觀念，並認真參考東西德領導人的智慧，兩岸最終將可達成統一。¹⁹

吳東野、魏艾、張虎、沈清松等人，則分別從政治、經濟與文化面研究兩岸的關係。²⁰

三、理性選擇途徑（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認定兩岸對於兩岸關係政策的決定，是依據最有利於己方所做的最理性選擇，並依此推論兩岸關係的發展，如：Lowell Dittmer、Emerson M.S. Niou、包宗和、Allen S. Whiting、吳玉山、涂志堅、唐欣偉、高朗、張亞

397。

¹⁸ 張五岳，分裂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頁 125。

¹⁹ 張五岳有關兩岸關係著作：1、分裂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業強，1992）。2、「分裂國家模式之探討」，包宗和等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1999）。

²⁰ 請參閱：朱松柏主編，分裂國家的統一歷程（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1）一書中：吳東野，「中國統一問題的政治意涵」；魏艾，「從台海兩岸發展經濟經驗看中國統一」；及沈清松，「從文化交流展望中國的統一」等文。

中、吳新興、彭懷恩等人之研究。例如：

包宗和、吳玉山、涂志堅、唐欣偉等人，以「戰略三角」關係或其變形，作為兩岸關係研究途徑者。

國外學者 Lowell Dittmer 以戰略三角討論美國、蘇聯及大陸的關係，並將戰略三角作如下的假設定：侷限於太平洋及周邊地區、主觀設定每一主體地位相等以及沒有兩個打一個的假設狀況，否則就成了一邊與兩邊聯合的對抗，而非三角關係了，再將美、中（共）及蘇聯三角關係進行推演，²¹而國內學者包宗和的觀點係以前述戰略三角的觀點，將美國與台海兩岸納入三角的頂點，將戰略三角歸類為：三邊都是正關係的「三邊家族型」、兩邊正關係一邊負關係的「羅曼蒂克型」、一邊正關係兩邊負關係的「結婚型」及三邊都是負關係的「單位否決型」等幾類，再將一九五〇年迄今兩岸關係的態勢歸類，並依重要事件的發生，進行兩岸關係的描繪、解釋與預測。²²

²¹ Lowell Dittmer, "Mainland China's Position in the Pacific Strategic Balance: Looking Toward the Year 2000", *Issues and Studies* (Taipei), vol. 28, no. 1, 1992 January, pp. 1~7.

²² 包宗和，台海兩岸互動的理論與政策面向（1950~1989）（台北：三民，1990）；尼克森重定對華政策之研究，政大外交研究所碩士論文，1979；「戰略三角角色轉變與類型變化分析--以美國和台海三角為例」，包宗和等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1999）。對於過去戰略三角的變化，包宗和將台灣、大陸、及美國在戰略三角上，做如下的闡述與安排：（1）、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〇年：結婚三角形時期；認為美國與台灣是伙伴，中共是孤雛。（2）、一九六一到一九六八年：朝羅曼蒂克型三角過渡之結婚型三角時期；期間如美國總統甘迺迪、詹森，分別試圖以「兩個中國」政策，或表達與中共合作意願，但因種種因素，而未見兩國關係發展。（3）、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八年：開始行動朝羅曼蒂克型三角過渡之結婚型三角時期；其間，如美國總統卡特以與中共達成建交協議，並與台灣斷交，進入了美國為樞紐的羅曼蒂克三角關係。（4）、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六年：朝向三邊家族型三角過渡之羅曼蒂克型三角時期；期間，在美國與中共建交，又以台灣關係法保障台灣的安全，但在兩岸關係敵對下，未能達成三邊關係均為正的家族型狀況。（5）、一九八七到一九九四年：三邊家族型關係時期；天安門事件，中共有求於美國在國際上緩和國際的制裁，台灣在此時期亦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兩岸關係大步向前邁進，三邊關係儼然已成爲正關係的家族型三角形。（6）、一九九五迄今：從三邊家族退化爲結婚型，再提升爲羅曼蒂克型，進而逐漸回歸三邊家族型三角關係之時期；期間，因李登輝訪美、台灣直選總統，兩岸關係全面倒退，美國爲阻止中共對台武赫，全面協防台灣，使

另外以「統合論」(integration)作為研究途徑者，認為國家在特有環境下，理性地追求國家的最大利益，所以亦屬於此類；依據高朗的闡述，認為西方學界普遍認為統合論並非一套有嚴謹命題的理論，不同的學者於探討、發展統合論時，關懷的重點不同，所用的詞彙也很混淆。統合論的發展大致有幾個派別，包括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認為國際關係的變化，將隨科技進步而改變；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認為國際關係隨科技進步而改變之外，更是政治互動的結果，且互動的結果不一定是進一步的結合，也可能是關係倒退；及聯邦主義(federalism)，重在建立一套政治體制，理念在先「統」再「合」。²³

國內統合論學者，以張亞中先生、高朗及吳新興先生為例；其中，張亞中極力強調以統合論(integration)作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基礎，並認為統合論最具代表性的基礎觀念係源自：梅傳尼(David Mitrany)所說的「分枝說」(doctrine of ramification)，其主要內容是指：「一個部門的合作是另一個部門合作的結果，又是另一個部門合作的動因」，²⁴認為，只要兩個團體接觸、合作，就會像樹枝一般的衍生出其他合作領域，最後達成全面的交流與合作，就如同歐洲大陸各國經由一九五〇年代起的煤鋼、原子能與經濟共同體，因長年的相互交流，逐漸演化成今日政、經相結合的歐體一般，雖然「統合論」在實際運作上，也有可能因相互的交流與互動，終於將兩方刻意掩蓋的差異暴露出來，反造成相互的不信任與敵意的增加，²⁵就如同兩岸在交流開放後，兩岸官、民卻驚覺雙方的差距，不僅不能因交流使增進雙方相互瞭解，反而引起相互的猜忌一樣，

得三角關係成爲一正(美國與台灣)兩負(美國-中共及台灣-中共)的羅曼蒂克型，但事後美國與中共關係改善，台灣亦暫停對中共挑釁，而逐漸恢復到家族三角形關係。

²³ 高朗，「從整合理論探索兩岸整合的條件與困境」，包宗和等主編，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頁 43~53。

²⁴ 張亞中，兩岸統合論（台北：生智，2001），頁 136。

²⁵ 張亞中，兩岸統合論，頁 138~139。

但是，在兩岸現今所處僵持不下，有意解決卻又解決無方的最差關係環境中，有交流才有化解不信任的機會，而兩岸或許可從不具主權爭議的事務性合作上，開創出彼此的互動與信任，再逐漸發展政治上的諒解與合作，最後達成兩岸的和解，而不論其結果是統是獨。

高朗與吳新興則是以統合論（吳新興稱為整合理論）檢視兩岸關係可能統一或分離的狀況。²⁶吳新興、高朗與張亞中的統合論，顯然都是以「新功能論」一派作為基礎。另有彭懷恩亦有以「政治整合」的途徑研究兩岸關係。²⁷

四、菁英衝突途徑（the elite conflict approach）

以兩岸菁英的相互衝突，作為兩岸關係研究的基礎架構，如：張旭成、Robert S. Ross、蔡政文、張麟徵、邵宗海、趙建民等人之研究。

這類的研究模式，有濃厚的「菁英理論(elitist theories)」概念。

菁英理論認為，民主政治雖然已經成為現代政治迷思(myth)，無人敢予以反抗，但實際的運作與研究顯示，政治舞台上存在著一批活躍，且地位與影響力遠超出一般大眾的人物，他們位高權大，直接影響政策的決定，相較之下，一般大眾似乎渺小而無力。這就是菁英理論的立論根據。最著名的菁英理論家有 Gaetano Mosca 及 Vilfredo Pareto 等人。²⁸

Gaetano Mosca 的理論認為，任何社會中都可發現兩個階級，就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的人數總是比較少，擔當一切政治職務，獨佔權位勢力，並享受權位勢力所帶來的種種利益。被統治階級則受其控制指揮。而統治階級所賴以控制被統治階級的就是組織，有組織的少

²⁶ 請參閱：吳新興，海峽兩岸交流（台北：國立編譯館，1998）一書。

²⁷ 彭懷恩，台灣政治發展的反思，（台北：風雲論壇，2000），頁 346~357。

²⁸ 請參閱：莫斯卡(Gaetano Mosca)，涂懷瑩譯，統治階級論（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7 初版）。及巴瑞托 (Vilfredo Pareto)，劉北成，許虹編譯，菁英的興衰（台北市：桂冠，1993 初版）兩書，有關菁英統治的論述。

數人可以控制無組織的多數人。

Vilfredo Pareto 則用統計學的觀念來研究人類，他認為社會中人口在各方面都是常態分配，如果將人們在各活動範疇中，依其能力高下各賦予一個指數，則那些在其範圍活動範疇中有最高指數的人，合起來就是一個階級，就是菁英份子。在政治領域中的菁英份子，就成了統治的少數人群。

依據菁英理論的論點，在兩岸關係的議題上，領導菁英充分展現其影響力，如兩蔣堅決實行反攻大陸政策，李登輝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造成兩岸軒然大波²⁹，陳水扁弱化國統會的政府既有體制，提出「一邊一國」論等行爲，都是菁英份子展現意志，另創新局的作法，國內張麟徵、楊開煌等多位學者的研究都屬這類型。³⁰而依據兩岸政經架構研究模式者，也是此類研究途徑的衍生，如邵宗海及趙建民等運用大量第一手資料，研析兩岸間的變與不變、善意與空間，爲兩岸可能的走向提出具體建言，如：有關兩岸認同危機、直航的爭議、中共對台政策的理論與戰略、中共對台灣外交的壓制、大陸政策與對台政策等等主題的探討均是。³¹

五、不對稱政治過程途徑（the asymmetrical political approach）

以兩岸不對稱的政治、經濟、國力等現實面，作為研究兩岸關係的參考，如：Andrew Nathan、Hu Chang、鄭敦仁、吳玉山、施正鋒³²，及涂志堅、唐欣

²⁹ 請參閱：陸鏗，別鬧了，登輝先生：專訪相關人物談李登輝（台北市：天下遠見出版，2001）一書中，有關前陸委會主委蘇起就「兩國論」的研議與提出，及提出後面臨美國強大政治壓力，國內宣傳機關開始將「兩國論」中有關獨立的意圖導向「與中共對等」的意涵，終獲台灣民眾高達百分之七十幾的認同有詳細的說明，這充分展現，政治菁英創造民意、領導民意並利用民意的手段。

³⁰ 請參閱：張麟徵，硬拗（台北：海峽出版社，2001）及楊開煌，崢嶸（台北：海峽出版社，2001）等書。

³¹ 請參閱：邵宗海，兩岸關係兩岸共識與兩岸歧見（台北：五南，1998）。邵宗海，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台北：華泰，1996），及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台北：永業，1994）。

³² 請參閱：施政峰，「美國在東亞的軍事態勢—以台灣為考察重心」，張貼於：

偉等人所做的研究。³³例如：

吳玉山的「抗衡與扈從」就是以海峽兩岸不對稱實力作為研究的基礎，吳氏是以東歐三小國：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抗衡蘇聯，終於退出蘇聯獨立建國，及東西德統一過程中，東德在經濟衰退，無力與西德抗衡，西德憑藉其強大經濟實力，與國際上有利的地位終於壓制東德，使東德扈從，最後被併入西德，完成德國的統一為例，歸納出小國與大國的對峙中，小國需要在經濟上強過大國，並有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支持，才足以抗衡大國，否則只有扈從一途（小國不是被大國併吞，就是成為大國的附庸）。

在台海兩岸的對峙當中，吳氏將台灣比成東德，大陸比成西德，而台灣在過去經濟上優於大陸，又獲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支持，所以台灣像極了東歐三小國，在國際戰略關係的架構中，台灣的戰略地位又弔詭的箝制著台灣的發展空間，而這種國際箝制關係，吳玉山將其界定為美國、蘇俄、中共為一個大戰略三角，與美國、中共及台灣的小戰略三角相結合的新戰略三角關係，台灣就在此「牽一髮而動美、中、蘇、臺」的新戰略三角中力求最有利地位。（關於「戰略三角」與「小戰略三角」的觀念，是以蘇聯未解體前作為假設依據，由蘇聯、美國與北京所建構的大戰略三角，加上美國、中共及台灣的小戰略三角，所形成的「新戰略三角」，來解釋台灣在國際環境中所受到的掣肘。）³⁴

美國為了均衡世界體系，故在九〇年代，同時加強與中共、俄羅斯及台灣的关系，台灣就依靠這種關係與中共對抗，若台灣在此關係中，對美國扮演 *trouble maker* 的角色，並損及美國利益，將會使美國的支持降

<http://mail.tku.edu.tw/cfshih/seminar/2002/2002.htm> 網站。

³³ 請參閱：涂志堅、唐欣偉，「從總體觀點看柯林頓政府時期的美『中』臺戰略三角」，張貼於：http://www.future-china.org.tw/csipf/press/quarterly/pq2001-2/pq2001-2_6.htm 網站。

³⁴ 吳玉山，抗衡與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台北：正中書局，1997），頁 186~199。

低，隨之而來的當然是中共的壓力增加，反之，台灣不論統、獨的行爲，在符合美國的利益前提下，則美國繼續支持台灣就完全可以預料，相對的中共的壓力就被抵銷，因此，在兩岸關係中，不忽略美國的介入，才能精確的描繪、解釋與預測兩岸關係。

除了這五類研究途徑之外，國內尚有以政治心理學為研究途徑者，如石之瑜就以政治心理學的範疇為兩岸關係的研究注入新的面貌，他對兩岸領導人的性格、決策文化、菁英的政策性格、民族性、兩岸社會的精神基礎等，以深厚的心理學基礎，論述兩岸關係。³⁵

盛治仁也常以政治心理學方式研究國內政情，再由國內政情的研究結果評析兩岸關係。³⁶

這些中外研究議題與途徑幾乎涵蓋當前兩岸關係的研究範疇，但每一途徑與議題都各有優缺點，無法放諸四海而皆準，正代表著兩岸關係研究議題與途徑的分歧與龐雜，而國內學者吳玉山就將兩岸關係研究的模式分為純政治類、純經濟類以及政治經濟學類；將兩岸關係以兩個政治實體加以對待，其中又細分為：國際體系、國家屬性及決策者三個層次加以分析，並認為現有的兩岸關係理論都沒有掌握到兩岸關係的兩個最大特性，就是「權力的不對等（power asymmetry）」和「主權的要求（sovereignty claim）」。³⁷

其中吳玉山選擇大陸明顯大於台灣的「權力不對等」現實，作為研究主題，而成就「抗衡與扈從」的論述，並意圖從中發展出兩岸關係的理論已如前述，³⁸但現今有關主權(sovereignty claim)之研究，卻集中在對於台灣主權法律定位的闡述，如李鴻禧、黃昭元、許宗力等人，以國際法或憲法角度所做的研究，但對於由主權的要求而進一步建構兩岸關係

³⁵ 請參閱：石之瑜，兩岸關係概論（台北：揚智，1998）。

³⁶ 請參閱：<http://www.scu.edu.tw/politics/member/sheng/shengpublish.html> 網站。

³⁷ 吳玉山，抗衡與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頁 7、10、17。

³⁸ 請參閱，吳玉山，抗衡與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一書有關論述。

的理論卻付之闕如，尤其是由台灣主權的要求內涵出發，關乎台灣主流民意，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現在及未來對大陸主權的主張擁有或放棄來研究兩岸關係者更少，進一步言，由此牽出台灣民眾對於國家認同的主張，並經由國家認同的力量，以民意支持台灣各階段政府在國際困境中與中共所進行周旋的研究絕無僅有，而以台灣國家認同民意變遷作為研究兩岸關係的途徑，將可補充了兩岸關係研究理論的不足。

換言之，以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作為兩岸關係的研究基礎，就有其發展與討論的空間。

第三節 理論與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途徑與研究架構

一、理論與概念

行政院陸委會前主任委員蘇起，認為若細分兩岸關係可以有：軍事、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五個層面，其中政治面全由政府主導，軍事、外交幾乎全由政府主導，是屬於硬的一面，而經濟、文化屬於軟的一面，在台灣由民間主導，在大陸則仍受政府節制，³⁹本文所著重討論的兩岸關係自然亦以硬的一面，尤其是以政治面的緊張或緩和做為重點，部分以軍事及外交層面關係做為佐證，而一九九六年兩岸關係陷入低潮後，大陸在政府控制下的經貿與文化不斷加強與台灣關係，除兩岸利益追求所致外，很大一部份原因，是中共旨在防堵台灣與大陸切斷關係，可能產生更加嚴峻的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問題，因此，由中共當局節制主導與台灣加強經貿、文化交流，所以，嚴格說來，在一九九五年兩岸再度緊張後，兩岸經貿、文化兩個「軟」層面的關係，並不因政治、軍事與外交「硬」層面關係的緊張而中斷，甚至在某種階段上兩岸的「軟關係」為因「硬關係」緊張而更加熱絡，這種現象正是中共利用「軟關係」彌補「硬關係」不足的策略運用，「軟關係」的熱絡，長期或有助於「硬關

³⁹ 蘇起，危險邊緣：從兩國論到一邊一國（台北：天下文化，2003），頁 66。

係」的緩和，但在兩岸各自堅持意識型態的環境下，其效果有待進一步研究。

對於「國家認同」的英文字意 *national identity* 的爭議很多，國內學者江宜樺做出細緻的區分，他認為，英文的 *nation* 雖可指涉一切治權獨立的政治共同體，如希臘的「城邦」、羅馬「帝國」、近代「民族國家」、東方「專制王朝」、以及非洲的「部落」，這種廣義的「國家」相當於英文的「政治實體」(*body politic*)、「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或「政治體」(*polity*)，也可指涉近代才出現的「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江宜樺在討論「國家認同」問題時，將「國家」限定為廣義的國家，也就是「政治共同體」。⁴⁰

江宜樺在另一著作中，更明確的表示，*nation* 雖可以指涉為國家，但卻有比較豐富的文化歷史意涵或甚至血緣族裔關係，*nation* 比較適合翻譯成中文的「民族」，而 *national identity* 比較接近於民族認同，所以江宜樺甚至考慮以自創的 *state identity* 來處理國家認同的問題，並延引印度裔的英國學者 *Bhikhu Parekh* 的論述，認為為了避免 *nation* 所帶來是「國家」或「民族」的爭論，最好以「政治的集體認同」(*collective identity of a polity*) 來加以取代，並以「政治共同體的認同」(*the identity of political community*) 指涉前一種討論，江宜樺認為 *Bhikhu Parekh* 的意見等同於其所意圖創造的「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 一詞。⁴¹

換言之，江宜樺將 *national identity* 限定為「政治共同體的認同」，絕非如許多人將「國家」、「國族」、「民族」不加區分混為一談，⁴²而衍生出爭論不斷的族群認同、國族認同或其他含意的認同，本論文採用江宜樺的觀點，也將 *national identity* 翻譯成的「國家認同」指涉為「對中華民國

⁴⁰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2000），頁 6~7。

⁴¹ 江宜樺，「新國家運動下的台灣認同」，林佳龍等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哈佛大學東西學者的對話（台北：新自然主義，2001），頁 190~191。

⁴² 江宜樺，「新國家運動下的台灣認同」，頁 189。

國的認同」。

事實上，國外學者 Ross Poole 認為區別 nation 為富政治意味的 civic nation 或不富政治意味的 ethnic nation，是在於道德倫理的成分與政治的成分多寡，⁴³本論文強調政治的國家認同，自然接近於 Ross Poole 所說的 civic nation，也就是說，本論文所說的 national identity 當然是指富含政治成分的國家認同，而非富含道德倫理成分的民族認同。

那麼，「認同」的內涵又是甚麼？

「認同」(identity)的形成是經過不斷的自我省思：「我是誰？」，以及「他是誰？」引伸到團體就成了：「我們是誰？」及「他們是誰？」的問題。⁴⁴

這也可藉由馬克思所稱的「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兩種概念加以說明，前者是以既有的社會階級關係方式存在，但階級內部成員間不一定具備了相互認知、認同，也不見得都依據這種階級關係做出特定行為，而後者則是因階級份子相互認識，而取得了行動所需的「情同感」(solidarity)與自主意識，⁴⁵「認同」就是這種基於我們與他們的區別，發展出來具有「情同感」的相互認識與行動的感覺。

江宜樺則認為「認同」(identity)應該包含三種含意，分別是第一種「同一、等同」(oneness, sameness)，指某種事物與另一時地之另一事物為相同事物的現象。第二個含意是「確認、歸屬」(identification, belongingness)，「確認」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識自己的特徵，從而知道自己與他物之不同；「歸屬」是指經由「確認」自己與他者的不同及與同類的共通性，進而肯定自身的群體性。第三種含意是「贊同、同意」

⁴³ Ross Poole, *Nation and Identity*(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p. 43.

⁴⁴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台北：正中，1993），頁 45～46。

⁴⁵ 張茂桂，「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8），頁 96。

(approval, agreement)，這層含意具有「主觀意志」，使「認同」帶有一種「意志選擇」的色彩，與前述兩種意義偏向「客觀辨識」的情形不同。「認同」有如此不同的含意，自然「國家認同」也可能有三種不盡相同的用法。⁴⁶

三個表示方法分別是：「一個政治共同體與先前存在的政治共同體是同一個政治共同體」、「一個人確認自己歸屬於那一個政治共同體，並且指認出這個共同體的特徵」及「一個人表達自己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有何期待」，綜合起來看，國家認同就有三個不盡相同的意義：一、政治共同體本身的同一性，二、一個人認為自己歸屬於那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辨識活動，及三、一個人對自己所屬政治團體的期待，或甚至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的選擇。⁴⁷

有學者認為，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內，台灣社會中自我認同是台灣人的比例不斷快速增加，且明顯超越了自我認同為中國人的比例，同樣的台灣人民中，支持建立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人口也逐漸超過追求與中國統一的人口，這些現象說明人們的政治認同不是與生俱來或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著環境發生變化；⁴⁸所以有國內學者就指出，就漢文的字面來看，國家認同大致是指「對於國家的認同」，不過，這樣的定義並不周延，因為，認同不只是自己對於他人、族群、地區、理念、組織、或是國家的認定（identify with），更重要的是「對於自己的定位」（self-identity）。⁴⁹

由前述「認同」的定義與及對「認同」的討論，清楚的表現出「認

⁴⁶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8~11。

⁴⁷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11~12。

⁴⁸ 林佳龍，「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林佳龍等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 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頁 217。

⁴⁹ 施正鋒，「台灣教科書中的國家認同----以國民小學社會課本為考察重心」，張貼於 <http://mail.tku.edu.tw/cfshih/def5-2-020525.htm>。

同」會隨著時空環境變遷而變遷的基礎，推論出本論文所指涉的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就是指「自一九四九年迄今台灣人民在主觀上對於『中華民國』這個國家的歸屬、期待與選擇的情同感的變化」。

台灣近年來的民主化與海峽彼岸的戰爭威脅，是導致台灣人民民族建構與政治認同變遷的關鍵因素，⁵⁰而台灣民主化對兩岸關係是利是弊，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政治變遷使得台灣無法形成強有力的大陸政策，是不利於台灣，⁵¹但也有些學者認為有利於台灣當局以民意抵擋大陸的「強制外交」。⁵²而就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每個階段所代表的意義又有所不同，王甫昌就認為，在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層面上來說，到一九七九年發生美麗島事件為止，台灣反對運動的主要訴求，可以說是「民主化」，⁵³雖然由一九七一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起，到一九七八年的中美斷交，接連而來的一連串外交受挫事件，可能已威脅到「中國法統」的地位，但其主軸仍然是「民主化」，⁵⁴直到一九八〇年上半葉的連續外交挫敗事件，國民黨對於繼承中國法統的說法逐漸不被台灣民眾所接受，而將反對運動的「民主化」訴求，進一步激化成為台獨。⁵⁵

這種說法依據黃信介在「台灣政論」與「美麗島」雜誌的發刊詞內容，只強調民主政治的追求卻不強調台灣獨立的實現，及過去「黨外人士」在不斷的政治環境變遷過程中分裂為統、獨兩派，如前立委費希平被迫離開民進黨等，可以得到證明，這種激烈的轉變，呈現出來的現象是：政治上講求制衡反對效能、在文化上講求本土化反對傳統復興、在

⁵⁰ 林佳龍，「台灣民主化與國族形成」，頁 217、235。

⁵¹ Andrew Nathan, "The Effect of Taiwan's Political Reforms on Taiwan-Mainland Relations", in Tun-Jen Cheng & Stephan Haggard, eds.,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Colorado: Lynne Rienner, 1992), p. 207.

⁵² 吳玉山，抗衡與扞從--兩岸關係新詮：從前蘇聯看台灣與大陸的關係，頁 14~15。

⁵³ 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運動：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徐火炎等著，台灣族群政治專題（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 155。

⁵⁴ 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運動：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頁 158。

⁵⁵ 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運動：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頁 164。

心理上講求自主反對權威、在社會上講求自由反對法規、在法律上講求權利反對義務、在經濟上講求市場反對干涉、在資本形成上講求私營反對公營、在合法性上講求選票反對法統、在黨政運作上講求民主反對紀律，這些現象綜合起來構成對原有國家認同的毀敗，並為新的國家認同開創契機。⁵⁶

事實上，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是以反對國民黨的各項政策做為對民眾訴求的核心，其中反對國民黨政策中的國家統一理念，就逐漸轉變成台灣獨立的訴求了。⁵⁷

不論如何，台灣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是由追求民主化為起點，再逐漸演化到以追求台灣獨立為目標，最終發生台灣民眾對原有國家認同產生危機是不爭的事實，這代表著，國民黨政府自收回台灣後一直進行的，以傳統中國為目標的國家認同教育，在內政外交交相失利與情勢轉變下，最後不得不宣告失敗，⁵⁸而台灣會發生國家認同危機，除台灣民眾與清朝割讓台灣、日本殖民政府、國民黨政府的歷史恩怨，及反對運動政治領袖的操弄外，弔詭的是卻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來自一直以「統一台灣」為宗旨的中共對台強勢政策所造成，⁵⁹而台灣對國家認同的轉變，

⁵⁶ 石之瑜，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頁 72。

⁵⁷ Wachman, *Taiwan -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p. 131.

⁵⁸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p. 30.

⁵⁹ 請參閱：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台北：永業，1994），頁 8，及其他相關其他論述極多。又依據齊光裕，中華民國的政治發展（台北：揚智，1996），頁 161，引自外交部條約司統計我國外交關係與中共外交關係度比資料如下表，顯見我國在民國六十年退出聯合國後，外交環境迅速惡化的現象：

時間	與我建交國數量	與中共建交國數量
民國三十九年	53	26
民國五十二年	58	42
民國五十五年	60	50
民國五十九年	68	53
民國六十年	66	48
民國六十一年	39	58
民國六十三年	20	93
民國六十五年	26	109
民國六十六年	23	111

事實上是以國家認同的危機形態呈現，因此，每一個人被迫回答帶有濃厚統、獨政治意味，及包含國家認同的問題：「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時，常陷入兩難的矛盾中。⁶⁰

西方的學者認為，國家認同的面向太多，但最基本的國家認同需求，必須具有：⁶¹

1. 一個歷史的領土或國家（homeland）。
2. 共同的神話或歷史的記憶。
3. 共同的大眾文化。
4. 共同擔負的法律權利與義務。
5. 休戚與共的經濟利益。

因為國家認同是個多面向的概念（multidimensional concept），亦即，當國家認同被提出時，有人聯想到的是「流著同樣血的」血緣或宗族族群，有人則著重「親不親，故鄉人」，有人則強調主權政府下的權利義務關係，因此，國家對國民來說可能是「族群國家」、「文化國家」或「政治國家」，由這三個層面糾結在一起體現國家的認同，當然也可能以一個層面為體現的主軸，再輔以其他層面呈現國家認同的全貌。

所以，對不同的國民來講，國家認同可能是「族群國家」、「文化國家」或「政治國家」的不同認知，因此，江宜樺主張國家認同應該化約

民國六十八年	21	118
民國六十九年	21	121
民國七十年	22	122
民國七十四年	25	129
民國七十五年	23	131
民國七十七年	22	134
民國七十九年	27	134
民國八十年	29	133
民國八十一年	29	152
民國八十二年	29	156
民國八十三年	29	158

⁶⁰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11。

⁶¹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as Vegas: University of Nevada, 1991) p. 14.

成「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及「制度認同」三個主要層面來討論，⁶²大陸學者對於「國家認同」的理解，也有以前述三個環節加以闡述的，如吳能遠就認為，台獨份子爲了追求台灣獨立，以偷樑換柱的方式製造國家認同的分裂，爲了實現國家認同的分裂，試圖形成民族認同的分裂，爲了達成民族認同的分裂，於是推動文化認同的分裂。⁶³吳能遠顯然是以文化認同面向爲主軸，再輔以其他面向來討論國家認同。

筆者也以爲，依台灣特有與大陸區隔的海島、不斷因「外來政權」干涉而與大陸衝突的歷史、與大陸長期區隔且不同的政治、法律、經濟、文化體系，及西方學者所闡述的「光榮歷史」、「休戚與共關係」、「固有領土」等概念似乎可以相通，綜合起來，分由「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及「制度認同」這三個層面的討論，應該足以比較周延的涵蓋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

(一)、族群認同

近代的國家認同主要是以對族群歷史和文化的感情認同，所形成的民族認同爲基礎。⁶⁴顯見族群在民族認同中是必要元素之一，也顯示由族群認同建構出來的民族認同，在國家認同中所佔的重要地位。⁶⁵雖然，「國家認同」問題和「族群」問題，沒有統一的必然性，他們在台灣會同時被提出，卻是因爲台灣的特殊歷史過程。⁶⁶這使得台灣族群問題的提出幾乎等同於國家認同問題。

有西方學者將族群的認同，臚列六個必要條件：一個共同的適當

⁶²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15。

⁶³ 吳能遠，「關於台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題綱）」，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編，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論文集（北京：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2001），頁 29。

⁶⁴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徐火炎著，台灣族群政治專題（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 5。

⁶⁵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頁 15。

⁶⁶ 張茂桂，「談『身份認同政治』的幾個問題」，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8），頁 101。

「族名」、共同祖先的神話、共同分享的歷史記憶、一個以上相異於通俗文化的元素、與特有故土的聯繫、及族群母體（population）中重要關鍵部門的團結情感等等，並認為愈與所臚列的六個條件接近的群體，愈可以被清楚的認定為「族群」（ethnic）。⁶⁷

這六個條件，讓族群有「我群（We feeling）」的感覺，從而形成族群的凝聚，但經過族群「認定」後的族群，或許會有族群「認同」的衍生，而族群認定及隨認定而來的認同，在學界研究上，又可分為「原生論」與「工具論」（instrumentalism）或「功能論」兩派觀點，⁶⁸若以原生論（primordialism）的觀點看，族群的認同是指一個人由客體的血緣連帶，或主觀的對特定族群所產生的認同，如猶太人、中國人雖流離全球，經歷十數代，但仍被認為是猶太人或中國人一般。但實際運作上，族群的認同常又有「工具論」或「功能論」的夾雜，換言之，族群的認同常為了各種利益而被積極挑動，且在各類利益的爭取與挑動下，會產生族群認同的變遷；因此，「功能論」或「工具論」，是跳脫「原生論」範疇來建構族群，故也幾近等同於「建構論」。

台灣大致分可為外省、本省、客家及原住民四大群體，若純粹依據原生論的方式建構台灣民族，則無法周延的被各族群所接受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以工具論、功能論或建構論的方法，將四大群體以生命共同體或其他類似的方式圈成一個台灣民族，再以融合、團結、動員等方式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務，就成為不可避免的手段。而西方學者也認為族群或民族的認同，必須植基於共同的文化、感情、理念、相互瞭解與期盼等等因素，才足以讓族群團結在固有的土地（home land）上，⁶⁹其中被強調的是「感覺」而不是「血緣」，所以，「原生論」所強調的是否為同一血緣的因素，雖有其重要性，但在實際運作上反不被重視。

⁶⁷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21.

⁶⁸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16。

⁶⁹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11.

族群的建構與動員，看來與政治目的是無法脫離干係的，而族群最可能被動員的時機，是出現在下列兩個情況：流露出強烈的族群認同感以及此一族群團體處於相對劣勢的時候。⁷⁰

檢視台灣的族群認同逐漸被動員起來與大陸族群認同產生區隔的過程，大略是早年由國民政府以再社會化（re-socialize）的方式，要求受日本統治達五十年的台灣民眾「去日本化」，意圖使台灣住民「再度成為中國人」，造成與久經日本統治的台灣民眾不可避免的摩擦，又因教育民眾「中共是帝俄的冥蛉，絕非我族類」，無形中讓台灣背負延續法統重任，相對的與非法統正朔的大陸有了區別，加上二二八事件的不幸記憶及往後隨著國際情勢轉變不利於中華民國，而不斷描繪中國打壓台灣的形象，造成台灣這一邊的族群遭大陸那一邊的族群打壓印象，後又由於提倡本土化的政策強化了台灣的自我的認同，這些因素，都為日後政治領袖動員台灣族群與大陸對抗奠下基礎。⁷¹

更有甚者，是以生理上的差別區隔兩岸的族群，如台獨理論家們依據台北馬偕醫院的研究，發現台灣的閩南人和客家人是中國古代的越族而非漢族後裔，或說，台灣人是南島人與漢人的後裔，也不是漢人等等不一而足。⁷²

總之，由兩蔣時代、經李登輝到陳水扁政府的各項施政，已經在有意無意之間，將台灣四大族群融合成一特殊的「台灣民族」，與大陸的「中華民族」成為不同的族群了。

若進一步探究台灣與大陸相隔數百年來所衍生族群區隔問題，又可

⁷⁰ Ted Robert Gurr & Barbara Harff, 鄭又平等譯, 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 (台北: 韋伯, 2002), 頁 108。

⁷¹ 有關中國大陸對台灣打壓引起台灣人心理上的反感, 並進行台灣認同的強化與對傳統中國的認同趨勢, 可參閱: 石之瑜, 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 頁 126。

⁷² 楊開煌, 「理解台獨史觀、解構台獨教育」, 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編, 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論文集, 頁 361。

借用西方學者 Ted Robert Gurr 與 Barbara Harff 的分類，認為在政治上活躍的族群團體，有四類與現代國家並存：1.族國主義者（ethonationalists）2.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3.社群競爭者（communal contenders）及4.族群階級（enoclasses）。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族國主義者通常有過獨立的經驗，因此他們要求（重新）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原住民則主要關注他們傳統的土地、資源、文化的維護。社群競爭者是在多元社會中各種文化團體的一元，他們爲了分享政治權利而彼此競爭。族群階級則是爲了要求平等的權力與機會，以排除因其原籍和少數族群地位所產生的歧視效應。⁷³

若依這種分類來看台灣的歷史，從相繼被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到馬關條約割讓與日本時，唐景松等人所創建短命的台灣民主國，再到二戰後重要國際會議文獻均未言明台灣主權歸屬，及台獨人士視國民政府爲外來政權等現象，兩岸關係下的台灣族群認同範疇應該屬於「族國主義」者，換言之，從族群認同出發的國家認同上看，台灣族群認同從「中國」到「台灣」的演變中，「復國」應該成了重要的意識型態，雖然支持台獨人士至今未見使用「復國」訴求，而大量使用「建國」訴求；現今台獨運動，面對引起國際糾紛及中共的激烈反應的現實壓力，實際上卻以「中華民國已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不需要宣佈獨立」作爲訴求，但事實上，台獨支持者等族國主義者要求的當然是與大陸切斷關係，建立一個有別於大陸的新而獨立的國家，這種訴求就自然與「台灣民族」的形塑，與「台灣民族主義」的提倡，形成共生關係，難以避免。

「台灣民族的形塑」與「台灣民族主義」的提倡是如何在政治上運作的呢？在實際政治運作上，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親密的結合，是反對運動的一體兩面，⁷⁴台灣由最早的民主運動到本土化運動，再到創建台灣民

⁷³ Gurr & Harff，鄭又平等譯，國際政治中的族群衝突，頁 21。

⁷⁴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衝突、共生與解決」，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

族，以區別於中華民族的過程，正是以民主化動員台灣人民向國民黨奪權，再透過各種管道教育台灣住民，使純化為台灣民族，而國家認同又是民族主義的核心；若說國家認同是一群人在主觀上認為他們屬於相同的一群人，而且是應該具有政治主體的一群人，那麼，民族主義（或民族運動）則是企圖在現實世界中利用各種手段，去創造、散播及實現這種想法的政治行動。⁷⁵

進一步言，自李登輝以降的國家領導人，真正的企圖是以民族主義的方式建構「台灣民族」，並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獨立的主權國家。

族群認同問題更是解釋台灣選民政治態度與行為的重要變數。更具體的說，「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認同是影響台灣選民意識型態及投票抉擇的強有力變項，⁷⁶換言之，若認同台灣的「台灣民族（包含本省人、客家人、外省人與原住民）」多於認同中國的「非台灣民族（包含本省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則主張台獨的候選人與政黨勝選的機會增加，反之，則主張一個中國的候選人與政黨勝選的機會增加，而選民在選舉時的黨派投票抉擇，不僅只是政黨的選擇而已，更牽涉到國家未來政治目標的取捨。⁷⁷在「政權合法性」與「選票極大化」機制制約下，經勝選而主政的政治領袖，自然不得不隨人民包含強烈政治目的族群認同而釐定兩岸關係。

所以，在政治領袖將台灣族群問題，形塑等同成就是國家認同問題的大環境下，隨著族群認同的改變，兩岸關係的運作自然也會有所不同的。

至於觀察台灣族群認同變化的指標，筆者以為，在前述建構論、我

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頁 16。

⁷⁵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衝突、共生與解決」，頁 20。

⁷⁶ 游盈隆，「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徐火炎等著，台灣族群政治專題（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 76。

⁷⁷ 徐火炎，「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間的時政研究結果」，頁 85。

群感覺（we-feeling）等條件糾纏下，以「我是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或其他相類似的民調數字最具指標性，這種「自我認定」的標準與選擇，也與國內研究成果或已有文獻吻合。⁷⁸在欠缺民調數據的兩蔣時期，則以教育制度的推行、其他相關制度的設定及兩蔣的重要指示，作為檢視台灣族群認同的依據。

（二）、文化認同

是指一群人由於分享了共同的歷史傳統、習慣規範及無數的集體記憶，所產生出來的認同感。而文化的認同更是國家認同的起始與結果。⁷⁹文化認同又更是民族主義的核心。⁸⁰更有學者認為就算種族（race）的認定，也不能僅憑生物學的血緣為界線，而脫離文化認同與運作的範疇。⁸¹可見文化認同在人類活動中所佔重要的地位。

為因應文化的多樣性、不易明確劃分與闡述性，筆者以為，要判斷台灣文化認同轉變的重要指標，是要檢視政府與台灣人民對於本土文化提倡、歷史教育內涵、語言使用情形等等，甚或類似的作為與政策，因為這些作為與政策，不僅對當代台灣民眾的文化認同有積極的影響，對於下一代甚至下幾代的台灣人民的影響更是深遠，而國外學者也持相同對看法，認為語言（vernacular language）、出版（print language）、傳統、學校教育、生活形態等的轉變與認同，是形塑文化認同，並從中形塑「他們是誰」、「他們的國家」、「傳統的歸屬」等等，甚至進一步成為族群或民族（nation）認同的重要過程。⁸²顯見「文化」雖龐雜，但對於認同及推動認同的作法確有可循的範疇。

台灣社會在五〇年代到八〇年代，「國家認同」中的文化層面主要是

⁷⁸ 游盈隆，「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頁 45。

⁷⁹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52.

⁸⁰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74.

⁸¹ Etienne Balibar, *Race, Nation, Class – Ambiguous Identity*(New York: Verso, 1991), pp. 21~22.

⁸² Ross Poole, *Nation and Identity*(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pp. 26~31.

由中國文化所主導，八〇年代自由主義的衝擊，也引起對台灣文化再認同，及解決因台灣人民認同不確定，而引起的當前社會問題的呼籲，⁸³這種台灣文化認同的興起，在某個層面上，也被視為對台灣領導階層要求台灣認同中國文化的反動；⁸⁴到了九〇年代，更有一股建構台灣文化認同的力量急速升起，使得整個社會對文化認同產生割裂與衝突，進而影響及政治認同。這種現象正驗證了「本土化」造成本身族群、文化與他群的區隔現象，⁸⁵也是因為這種區隔，加速了自我認同的形塑。

事實上，不論在理論層面或是在事實層面上觀察，世界潮流在一九五〇年代是走向「國家整合」的年代，而一九六〇年代族裔意識不但未隨現代化的進展而消失，反而被加強，也造成了西方世界日趨惡化的種族衝突，到一九七〇年代，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的理論逐漸取代一九五〇年代盛極一時的整合理論，到一九八〇年代，「同化論」者的聲音漸趨式微，「文化多元主義」論調普遍被接受，族裔(*ethnic*)因素更成為影響投票決定的一個重要變項。⁸⁶台灣與大陸的人民構成上，基本上雖以漢族為主軸，但在政治因素與天然屏障隔離下，兩岸卻有族裔與文化分離的現象，更在政治意識型態強化下變得更強。

中國大陸對於台灣以本土化名義強調兩岸在文化上的差異，並從中進行台灣認同的作為，通常被以「文化台獨」稱之。自李登輝以降，雖台灣的領導人不斷想將台灣公開獨立於大陸之外，但是囿於國際情勢，又無法獨立，就像李登輝於一九九九年間發表「兩國論」後，在美國壓力下，承諾不將「兩國論」入憲，⁸⁷在輿論宣傳上，將「兩國論」轉化成「對等的兩個政治實體」，盡一切力量淡化最激進的台獨立場，強調兩岸

⁸³ Wachman, *Taiwan -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p. 103.

⁸⁴ Wachman, *Taiwan -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p. 119.

⁸⁵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p. 127.

⁸⁶ 葛永光，「文化多元主義與國家整合-兼論中國認同的形成與挑戰」，頁 6~7。

⁸⁷ 陸鏗，別鬧了，登輝先生：專訪相關人物談李登輝，頁 171~172。

對等的地位，才獲得大多數台灣民意的支持，⁸⁸而陳水扁在二〇〇〇年總統就職演說中的「四不一沒有」，及二〇〇二年發表「一邊一國論」之後，在各方壓力下又自我宣傳說「『一邊一國』論是兩岸關係的事實陳述，無關台獨」，「走台灣自己的道路」是「走民主、自由的路」，不是指台獨的道路等等，⁸⁹都是不得不的妥協行爲。

雖然國際情勢限制了台灣宣佈獨立，但在主政者所能主導的「內政」問題上，卻從不停滯推動台灣的獨立，如政務官帶頭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盡可能少用中華民國或混用中華民國與台灣作為國號、大幅修改中小學教材、教科書等等，⁹⁰而在大陸學者的眼中，台灣政治領袖李登輝及陳水扁更是大力在台灣島內宣揚「文化必須台獨」的思想，其具體的作爲是：⁹¹

1. 主張台灣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主要論述重點認為，台灣文化是揉合了荷蘭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漢文化、西洋文化等，而中國文化僅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或說台灣文化有原住民文化、福佬系文化、客家文化、大陸系文化等四個系統，與大陸所提倡的「中國文化」顯有不同。

2. 主張台灣是海洋文化，中國是大陸文化。

認為大陸文化是保守、僵化的，比較不會變動的，海洋文化是冒險的、模仿的，比較求新求變的，兩者顯然又不同。

3. 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必須加以淘汰或徹底拋棄。

民進黨的文化政策白皮書就明白標示：「過去的『中華民族：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因為違背了多元融合的理念，並且有助於中華人民共和

⁸⁸ 陸鏗，別鬧了，登輝先生：專訪相關人物談李登輝，頁 184。

⁸⁹ 請參閱行政院陸委會在陳水扁「一邊一國」談話後所公布的說帖，張貼於陸委會：<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網站。

⁹⁰ 楊開煌，「理解台獨史觀、解構台獨教育」，頁 353。

⁹¹ 陳孔立，「台灣『去中國化』的文化動向」，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編，中華文化與兩岸關係 論文集，頁 249～255。

國對台灣的主權要求，.....必須逐漸徹底拋棄」。在擁護台獨人士如李登輝眼中，更將貪污腐化、殘暴、鬥爭、欺騙、虛偽，以至髒亂、吐痰都等同於「中國文化」，台灣爲了美好的將來，當然要將「中國文化」去除而後快。而在學者的眼中，陳水扁就職總統以來，推動「文化台獨」絕對是不遺餘力的。

有西方學者認爲，人民透過本土的語言與文化就可建構「我們是誰」、「我的國家在哪？」、「我們的傳統是甚麼？」及大眾共同分享認同（identity）的目的。⁹²在諸多學者的眼中，前述陳水扁政府的作爲，當然是在區隔兩岸文化，讓台灣經由這些作爲，排斥「中華民族」的語言文化，強調並使用「台灣民族」的語言文化，使民眾經由對台灣文化的重視而認同「台灣文化」，並由逐漸遠離「中國文化」而不認同「中國文化」，最後使台灣民眾建構台灣的國家認同。台灣民眾經由文化認同的改變，進而造成國家認同的改變，在形成台灣主流民意之後，自然影響及台灣領導人的兩岸政策，及所建構的兩岸關係。

（三）、制度認同

是指一個人對於特定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肯定而產生的政治性認同。如美國與新加坡，其組成國民來自各種族、各地區，雖在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的觀點上，並不足以提供這些國家強有力的凝聚力，但這些國家的凝聚力與國家總體表現卻非常亮麗，這種成就應歸功於人民對其國家制度的認同所致。

若以美國的國家認同爲例，美國國家認同的形成，與傳統國家認同因子不同：第一，美國沒有共同的宗教。第二，美國人沒有一個祖先自無法記憶的世代以來就辛苦耕耘、並且埋葬於斯的歷史領土。第三，美

⁹² Ross Poole, *Nation and Identity*, p. 26.

國沒有特有的文化和精神元素，而僅有與母國英國牢牢綁在一起的語言、文化、法律和文學，獨立追求的合理化基礎並非群體的認同，反而是爲了成就英國的憲政精神。但美國國家認同無疑是成功的，其中的奧秘是因爲美國的民主體制的驕傲。⁹³所以在美國建國的過程中，不同的歐陸移民拋棄傳統，建立自己認可的國家與新的文化，既使成爲歐洲人眼中的特異主義者（exceptionalism）亦在所不惜，就如同一九一五年美國總統威爾森（Woodrow Wilson）告訴一批新歸化的美國人說，他們剛剛宣示效忠的不是一個個人，而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偉大的信念及人類的偉大希望一般；⁹⁴「美國人」的認同乃得自於對自由、平等政治理念的認同，而不是在追求種族、語言、宗教或血緣的一致性，由於是以政治理念作爲民族認同的基礎，所以，美國民族的形成與建國制憲的過程幾乎是同步的。⁹⁵所以，美國制憲所揭櫫的自由民主理想，同時也就是形成族群認同的內涵，至於美國境內住民的血統與歷史反倒成爲次要。⁹⁶美國人依據自由主義在美國新大陸所實現的，並被最大多數人所認可與支持的政治制度安排，而後同步建立了「美國人」認同，國內學者也論證得出，在自由主義基礎上，應強調公民多設想自己所認同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方面是否具備足夠合理的設計。⁹⁷對於制度認同乃至於整個國家認同的穩固都具有決定性的幫助。

若依此推論，國家建構時所揭櫫的理想與建國目標，就成了國家認同中制度認同此一環節最重要的因素。依此角度來看，人民認同或不認同一個國家的制度，是依據該制度是否被人民所接受所認可爲基礎，若

⁹³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頁 23～24。

⁹⁴ Ernst B. Haas, *Nationalism, Liberalism and Progres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97), p. 112.

⁹⁵ 楊泰順，「美國人認同的形成」，*美歐季刊*（台北），第十四卷第二期，2000 年夏季號，頁 212。

⁹⁶ 楊泰順，「美國人認同的形成」，頁 205。

⁹⁷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110。

該制度不被人民接受、認可，並轉化成強烈的支持，則國家的認同程度自然減弱，這種以人民自由意志為制度認同基礎的情狀，就是自由主義所最標榜的情境，兩岸人民對各自國家的認同亦復如此；所以有學者認為，在台北與北京的對抗競賽中，如不談制度與立國精神主張之差異，台北就無以為恃了。⁹⁸而筆者以為所謂被認可與支持的立國精神與政治制度安排，最能具體加以表現的就是憲法內涵，及其衍生的重要法律規定。

台灣人民對台灣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認同高於對大陸極權、專制的政治制度認同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可在諸多民意調查資料中獲得證明，更何況，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至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的東歐劇變、大陸天安門事件及蘇聯的瓦解，更代表著共產主義不如資本主義（三民主義），所以台灣人民更有能力強調台灣所行的資本主義（三民主義）制度優於大陸的共產主義制度，台灣的資本主義（三民主義）制度更足以成為台灣民眾認同的制度，所以台灣更應與大陸分離，縱使一時不能分離，至少台灣也不能被統治於欠缺民主、自由、法制與法治精神的共產主義制度之下。

在台灣，最足以呈現對制度認同的基礎，就是對現行中華民國憲法的認同問題。中華民國憲法於民國三十六（一九四七）年在大陸開始實行，並經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被迫退守台灣迄今，其間因中華民國政府對抗中國共產黨的需要，將憲法中的人民權利義務凍結大部分，而迭遭異議人士詬病，台灣在李登輝本土化後，將原有憲法經過多次修訂，終於使得李登輝於一九九九年接受「德國之聲」總裁魏里希（Dieter Weirich）等人專訪，發表引起全球矚目的「特殊國與國關係」言論時，明白表示：⁹⁹

「……我國並在一九九一年的修憲，增修條文第十條（現在為第十

⁹⁸ 石之瑜，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頁 165。

⁹⁹ 行政院陸委會編著，李總統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中華民國政策說明文件（台北：陸委會，1999），頁 2。

一條)將憲法地域效力限縮在台灣，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統治權的合法性.....使(台灣)所建構出來的國家機關只代表台灣人民，國家統治的正當性也只來自台灣人民的授權，與中國大陸完全無關。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的內部關係.....。」

雖然，一九九一年修憲，仍將最高民意機關的立法委員來源包含有自由地區、不分區、原住民及海外等四大來源，在形式上仍藉由自由地區(相對於大陸的不自由地區)及海外兩來源彰顯中華民國憲法仍是「代表全中國」，¹⁰⁰但依據李登輝前述的說詞，及海外代表必須放棄僑居地國籍，只能擁有將主權實施範圍侷限於臺、澎、金、馬等地區的中華民國國籍來看，顯然「代表全中國」只是聊備一格，無實質的效益，真實的狀況是，自一九九一年修憲後，台灣已將政府的權力來源侷限於台澎金馬及附屬島嶼，與大陸無關，其主權不及於大陸，相對的也排除大陸主權的主張，所以自李登輝以降，尤其是在一九九一年修憲後，台灣所實行的憲法，雖與一九四七年以來所實行的憲法在名稱都是：「中華民國憲法」，但其權力來源卻大不相同，台灣人民對這個國家根本大法，及由這個根本大法所形塑出來的國家制度，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形塑出來的政治制度，在認同上當然有所不同。

進一步言，自李登輝以降，台灣政治領袖要求台灣民眾在制度上認同台灣「這個國家」，不認同大陸「那個國家」的企圖¹⁰¹，與兩蔣時代，政治領袖要求台灣民眾在制度上認同「國民黨的中國」，不認同「共產黨

¹⁰⁰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pp. 65~66.

¹⁰¹ 陳水扁以總統身份，在2002年8月3日以視訊會議方式，參加在東京舉行的「世界台灣人同鄉會」時，提出「一邊一國」論，引起軒然大波，雖然事後經過扁政府幕僚及陳水扁親自的不斷解釋修正，但在國家認同層面上言上，以台灣為獨立主權的訴求，比李登輝「兩國論」更為明確卻是不爭的事實。

統治下的淪陷區」，在質上的差別，猶如天壤。¹⁰²

在兩蔣的時代，大陸在台灣民眾的政治教材中，連「國家」都不是，更遑論對其政治制度認同與否了，這種認同的轉變，已經由國、共兩敵對政黨的認同，提升到一中一台敵對國家的認同層次，其轉變之大，雖被隱藏在「中華民國憲法」同一名稱之下，但對兩岸關係的思維與影響，卻是從「戡亂」到「追求未來民主、均富的一個中國」再到「一邊一國」互不相干的境地。這種基於自由主義思維所產生的制度認同結果，成為對抗以「一個中國」為前提的思想武器，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合理化的基礎，尤其是台灣族群認同轉變尚未完成的現在，更是如此。¹⁰³

在台灣國家認同中的制度認同面，依據自由主義的運作方式，就是民眾對於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尤其是憲法及相關政治制度安排接受與認可情形，這就成為檢測台灣民眾國家認同中有關制度認同環節的指標。

以台灣自兩蔣、李登輝到陳水扁的過程中，或有論者質疑兩蔣時代或許人民無法自由表達意願，並成就憲法及相關政治制度規定的制度的認同，但在高壓與專制制度下，使得大多數人民除了接受國民黨政府自大陸帶來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之外，也無法表示反抗，而中華民國憲法在兩蔣時代，雖然諸多關鍵性條文被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所凍結或直接取代，但在國民黨黨國不分的列寧式領導下，仍大體堪稱運行無阻，而台灣人民也在此情況下接受中華民國憲法，或依據該部憲法所制訂的動員戡亂臨時條款所規定的政治制度安排，並依據這種安排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運作，自然可視為對於當時政治制度的認同，國內學者也認為，當一個人不願意在制度認同層面認同國家，又不願離開國家領域（筆者認為其中也包含不能離開者）時，他們會被強加以國家壟斷性的暴力，強迫使其低頭，使得這些人好像在先前認同這套制度的遊戲規則

¹⁰² 對於台灣憲法轉折與台灣國際人格定位的論述，請參閱：黃昭源主編，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台北：學林，2000）一書中相關論述。

¹⁰³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頁 36。

一般，¹⁰⁴換言之，就算是在兩蔣不能隨意以自由主義為基礎展現民意的年代，在政治制度安排並運行無阻力的狀況下，仍應視同台灣民眾的制度認同順暢，而當時序進入李登輝及陳水扁時期，因台灣政治環境的開放，台灣民眾對於憲法的多次修訂及運行，已然可以配合各級民意代表及政府首長的直選，而透過民主機制加以掌控，對於制度認同的檢測就更加明顯與穩定。甚至有學者主張，認為當前的台灣與當年美國建國情勢相似，是將族群認同與制度認同同步發展，¹⁰⁵亦有論者主張，當年美國建國牽涉到盟約（*covenant*）的精神力量，才足以使來自世界各地的各民族在基督教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透過相互認可與服從的盟約精神，建立並認同美國的政治制度，最後不僅建立了美國這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也逐漸創造出美國人的族群認同，¹⁰⁶若將台灣比做當年的美國，就成了台灣民族的建立與政治制度的建立正在同時進行，進一步言，當前的政治制度建立與獲得人民的認同，正是制度認同的展現，這個認同與台灣民族的建立與認同，將是相輔相承的。

又依據前述各家論者的意見，幾乎都一致以自由主義的制度認同為論述依據，認為政治制度的安排、運行及被人民所承認，才是國家認同的重要環節，而對於台灣制度認同的重要指標，筆者以為是對於憲政制度安排、重新安排、運作與被台灣人民所認可，最具指標意義，自由主義這種強調憲政制度的國家認同觀，在當代自由主義哲學家的論述裡都表現得十分清楚，如 *Jurgen Habermas*、*John Rawls*、*Ronald Dworkin*、*Martha C. Nussbaum* 等人就是。¹⁰⁷因此，本文對於政治制度的認同將以憲法及所牽涉的重要政治制度變革，作為制度認同的檢驗標準。

¹⁰⁴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134。

¹⁰⁵ 吳乃德，「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頁 25。其中吳乃德的國家認同等於本文的制度認同，族群社區認同等於本文的族群認同。

¹⁰⁶ 楊泰順，「美國人認同的形成」，頁 215~220。

¹⁰⁷ 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頁 110。

二、研究方法

本文旨在確認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轉變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而對於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的制約，依據江宜樺的論點，總的來說認為八〇年代以前，台灣國家認同中的文化認同層面是以中國為主流，再考據在兩蔣時代，對中共的敵對狀態無以復加，將中共的政治制度宣傳成極權、集權的說法，亦早被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所接受，因此當時的制度認同層面，台灣絕大多數人民「認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不認同共產黨統治的中國」是不容置疑的，又在經歷二二八事件後，國民黨政府極力壓縮人民對族群認同的質疑，所以在族群認同層面上，亦以認同自身是中國人為主流，反觀當時的兩岸關係，幾乎是可用「無關係可言」加以形容¹⁰⁸，八〇年代以後，尤其蔣經國晚年，兩岸關係因相互交流逐漸增加而緩和，當時台灣對大陸的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親疏遠近時有起伏，在制度層面的認同上台灣民眾對中共統治下大陸專制，仍抱持不信任態度，但兩岸關係的緩和有目共睹，時序進入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李登輝主導以「本土化」為治台主流意識，由文化認同、族群認同與制度認同三個層面所形塑的國家認同，都較八〇年代更與中國大陸分離，兩岸關係更形緊張，到九〇年下半年，經歷一九九五年李登輝出訪、九六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九九年「兩國論」提出，及兩千年代表台獨勢力的陳水扁當選總統，到二〇〇二年八月三日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兩岸關係降至冰點又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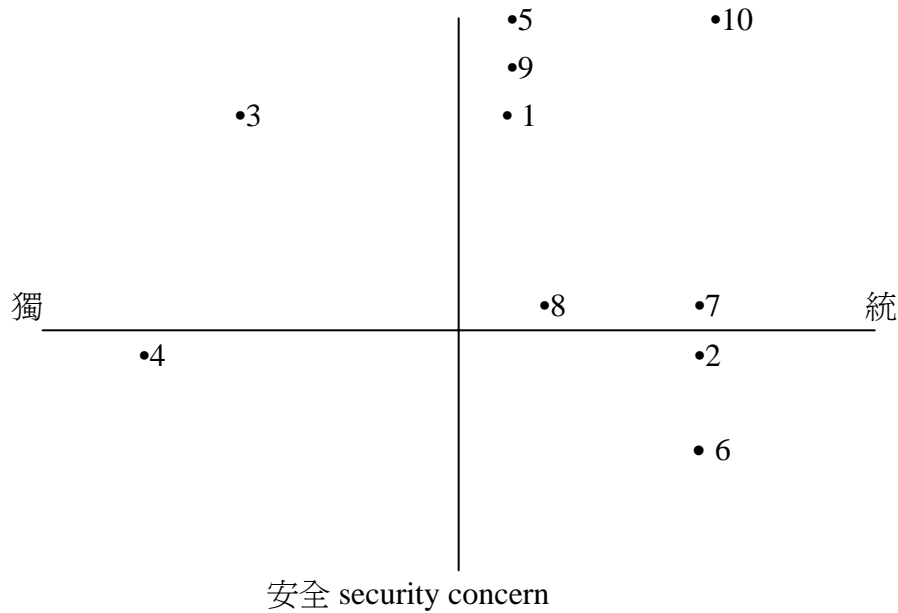
綜論台灣民眾對國家認同三個層面的走向發現，文化認同與族群認同兩個層次，隨兩岸時空環境分離久遠，雙方各自尋得獨立的發展方向，而漸趨互不隸屬互不認同的現象逐漸浮現，而制度認同層面由以往的完

¹⁰⁸ 參閱陳慶，中共對政策之研究（台北：五南，1990），頁 19。該書將兩岸的關係做出分期並加以論證詮釋，作者認為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之前，中共沒有具體的對台政策，事實上中共直到一九七九年鄧小平主導改革開放以後，兩岸關係才逐漸熱絡。

全排斥，逐漸演進到相互瞭解甚或容忍而進一步確認兩者不同（中共副總理錢其琛於「江八點」發表七週年會議中，公開演講歡迎民進黨黨員往訪大陸，或可視為中共容忍台灣政治情勢、台灣政治制度現實的表現），三個環節的轉變方向，正突顯出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方向。

過去有學者謝復生將大陸政策的制定，以各政治勢力的相互拉鋸，作為大陸政策理性制定的依據，如圖：¹⁰⁹

圖 1~1 大陸政策制訂各方勢力拉鋸示意圖
實質利益 (substantive interests)



說明：

- | | |
|-------------|-------------|
| 1 是國民黨主流派系 | 6 是國家安全系統人員 |
| 2 是國民黨非主流派系 | 7 是急統派人士 |
| 3 是民進黨美麗島派系 | 8 是陸委會 |
| 4 是民進黨新潮流派系 | 9 是經濟部 |
| 5 是企業主 | 10 是中華民國政府 |

這個經由 John Fuh-sheng Hsieh 推論出的圖形，充分顯示出各單位在考量統、獨、利益與安全的過程中所呈現的「落點」，也顯示出因為各政治勢力的考量不同，在相互折衝協調下，大陸政策的制定，就會有一定

¹⁰⁹ John Fuh-sheng Hsieh, "Chief, Staffers, Indians, and Others: How Was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Made?", in Tun-Jen Cheng, Chi Huang & Samuel S. G. Wu, eds., *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p. 147.

的理性思考存在，最後才有大陸政策決策呈現，這個假設，雖在說明大陸政策非一人所能獨治，同時凸顯台灣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相互衝擊的現象，其中更充分彰顯各政治勢力所表達其各自背後支持力量對國家認同的不同，政治領袖就是在這種國家認同迥異的內涵相互拉鋸下，對大陸政策做出決策，並形塑特有的兩岸關係。雖然，這個模型明顯的是在描繪國民黨主政時期各種政治勢力在圖形中的落點，在經歷公元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之後，其落點必然要有相當改變，但不論如何改變，其中所表現的各種勢力拉鋸，卻是絕對不會改變的，換言之，以制度認同、族群認同及文化認同三個層面交織呈現的國家認同，隨時序變遷，在已是自由民主國家的中華民國環境中，任何政黨及政治菁英的統、獨主張，都必須經選民投票認可的法定程序才有執行的可能，以比較理論的語言來說，就是現今台灣政治領袖早已被「主權在民」、「被治者同意」的民主政治模式所吸納，政治領袖與政治菁英必須以獲取最大多數選民支持為獲得施政機會的唯一標準，因此會忠實的反應最大多數的民意，反過來說，在前述的選舉情境中，不僅選民的政黨認同會決定其黨派投票抉擇，同時選民的國家認同也會成為其考慮是否支持一位政黨候選人的重要依據。¹¹⁰更何況，在灣意識型態一直都是主宰選舉過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相當程度上，選舉幾乎就是一場意識型態的角力，而台灣選舉中的意識型態更表現在「本土－外來」、「台灣－中國」、「民主－威權」上。¹¹¹使得「選票極大化策略」與「國家認同」的因果互動，更加密切與不可分離。

因此，所有政黨與政治菁英，對於兩岸政策施政及形塑的兩岸關係，都必須慎重考量「選票極大化」策略的運作，細微而專精的操弄並注意主流民意的變化，設法吸收最大多數選民的認可，更何況，早有論者論

¹¹⁰ 徐火炎，「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間的時政研究結果」，頁 113。

¹¹¹ 游盈隆，「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頁 276。

證，造成民意轉變的原因很多，但政治菁英的辯論應該是關鍵因素之一，¹¹²因此，檢視政治領袖對於國家認同的轉變，在信度與效度上都可以相當程度的將最大多數民眾的民意忠實反應，尤其是執政者的言行，更在理論與實際上都是最大民意公約數的代表，所以由政治領袖對於國家認同的言行與政策宣示，其本身所象徵的意義，及所造成的國家認同的轉變就制約了兩岸關係的發展，這個論述是本論文所要一一論證的主軸。

另依據民國九十年七月六日至九日的陸委會民意調查發現，雖然主張廣義維持現狀（包括「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永遠維持現狀」）的民眾仍占絕大多數（80.5%），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六到七月二十九日，主張廣義維持現狀的民眾也仍占絕大多數（77%），到民國九十三年二月民意調查又發現，過去一年贊同廣義維持現狀的比率約為八成，與歷年相比變化不大，與歷次調查結果趨勢一致，但歷次民調結果統、獨的變化亦隨兩岸緊張與緩和而有不同¹¹³，通常呈現兩岸緊張時，獨派氣勢高漲，而兩岸關係緩和時，獨派勢力稍弱的現象。又依據學者較為中肯的評析，認為統獨的民意表現，最能表現台灣人民對國家認同的轉變，因此，經由贊成統獨變化的民意，檢視台灣民意的國家認同趨向，並從中預測兩岸關係，是具有高效度（validity）與信度（reliability）的手段。本論文中將予以採用。

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也包含有：

（一）、文獻調查法（Literature Survey）

是最簡單的探索性研究方法，¹¹⁴利用各種原始文件、相關書籍、期刊、論文、報紙、統計資料，以及政府出版品，透過閱讀、整理，了解

¹¹² 游盈隆，民意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1999），頁 22。

¹¹³ 請參閱 <http://www.mac.gov.tw/mlpolicy/pos/900702/po9007ch.htm> 及 <http://www.mac.gov.tw/index1.htm> 陸委會網站所張貼相關說明。

¹¹⁴ 楊孝嶸，「內容分析」，楊國樞等編，社會行為與科學研究法（下冊）（台北：東華，1989），頁 51。

研究題目之背景資料及其他研究者的理論或發現，據以提出需要驗證的假設，並用以印證研究者的看法。本研究將整理所搜集之相關文獻，了解歷屆總統：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及陳水扁，在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制約下的大陸政策轉變，及大陸對此反應的相關參考資料，並以此作為研究之基礎。

(二) 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傳統上，內容分析是以系統、客觀、與定量方式，研究和分析傳播內容（語言與非語言的內容都在範圍之內）的一種研究方法，¹¹⁵用以檢視傳播內容本質、探討內容表達的形式、分析傳播來源的特質、蠡測閱聽人的特性、驗證傳播內容的效果，¹¹⁶此研究方法經過不斷的改良、運用之後，所謂具體的傳播內容，自然不僅只是大眾傳播媒介中的報紙、雜誌、電視、廣播、電影或書籍等媒介，而是指用任何型態可以記錄，可以保存，而具有價值的傳播內容（communication content）。¹¹⁷

本論文將針對一九四九年至政黨輪替後，台灣民眾在政治領導人或政黨的有意推動下，對國家認同產生主政者所希望的變遷，並選擇一九四九年兩岸分裂以來兩岸關係中重大事件，如：台灣撤退來台初年兩岸多次的軍事衝突、聯合國代表權之爭、一九九一年修憲、一九九五年及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一九九九年「特殊國與國關係」、兩千年政黨輪替及二〇〇二年「一邊一國論」等等，同時考慮兩岸政府與民眾的反應，及反反應，配合民意調查中統獨的消長情形，探究台灣民眾在這些重大事件中對國家認同的改變，再對兩岸關係進行分析，作為驗證研究成果之依據。

(三)、比較研究

¹¹⁵ Fred N. Kerlinger, *Behavioral Research* (U.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9), pp. 256~257.

¹¹⁶ 請參閱王石番，傳播內容分析法－實證與理論（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1），第三章相關陳述。

¹¹⁷ 楊孝嶸，「內容分析」，頁 809~810。

人類學家李亦園曾提出「文化比較研究法」(cross-cultural 或 cross-cultural study)，作為重要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之一，而「文化比較研究」的重點，是在於比較不同文化間所呈現的各類人類行為不同，¹¹⁸因此，若將兩岸關係的變化，依據此觀點在時間及國家認同轉變不同上做出比較，必可有所成就。

過去諸多學者在比較東西德、南北韓兩地區的統一、獨立、抗衡、扈從的國際、國內、歷史、經濟、政治等因素，整理出分裂國家在推動統一成功或失敗的案例，經由歸納、演繹等方法創造了多個理論，但顯然這些理論都不能涵蓋所有分裂國家的運作模式，尤其不能涵蓋台海兩岸的分裂狀態，本論文將在對不同時期的國家認同變化與兩岸關係所呈現的現象，做出垂直式的比較，並從中發覺國家認同變化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也讓現有的兩岸關係理論在考量國家認同變化下更加完善。

三、研究途徑

針對目前學界兩岸關係研究對於台灣人民國家認同主觀意志影響兩岸關係的探討不足，本文意圖以台灣人民國家認同的變化做為自變相 (independent variable)，將兩岸關係的變化作為因變相(dependent variable)來對兩岸關係加以探討，同時在假設中共對台併吞政策不變（變化的僅有中共對台作為手段）的情況下，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就成為影響兩岸關係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國家認同的轉變常來自於主政者對於人民進行政治社會化的結果。

那麼對於台灣國家認同這個自變相的探討又是如何？國內外學者對於台灣認同的討論，約略各自以下列方向進行：

（一）、族群認同：¹¹⁹

¹¹⁸ 李亦園，「文化比較研究」，楊國樞等編，社會行為科學研究法（上冊），頁 277～279。

¹¹⁹ 如王甫昌、林佳龍、施正鋒、徐火炎、徐宗懋、徐遠和、張茂桂、廖中山、Christopher Hughes、

論者以台灣人或新台灣人的建構做為論述的主軸，爭辯台灣住民雖多數移民自中國大陸，但在經過數百年的演變，及政治領袖，尤其是李登輝後期以來的有計畫推動後，是否逐漸將自己定位為與大陸上的中華民族不同的民族，甚至創造出「台灣民族」與之區隔；並因民族的不同，使得台灣對於國家認同的建構自成一格，與原本傳統中國的國家認同不同。

(二)、制度認同：¹²⁰

另一些學者，以台灣憲政層面已然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為論述主軸，爭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經過多年的憲政運作之後，是否已然成為一個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相關的獨立國家，並爭論台灣主流民意是否認同這個憲政體制，就等同於認同台灣是個新而獨立的國家。

(三)、文化認同：¹²¹

這些論者，是從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層面，爭辯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異同體系，同時衍生出兩岸人民對於兩岸文化領域的認同，是否為一個國家或兩個國家的爭辯。

但依據江宜樺對於國家認同的見解，認為國家認同應由制度、文化與族群三個環節的認同相互糾結才能具體表現，顯然現有國內外學者對於台灣國家認同的探討並不周延，使得論述呈現如下現象：

(一)、由西方一個民族建立一個國家的基礎出發，武斷地將族群認同論述與國家認同論述等同，認為族群認同的主客觀條件一旦形成，台

Anthony H. Birch、Peter Boerner、Craig Calhoun、Martha Cottan、Richard Cottam、Ernest Gellner、Ernst B. Hass、Anthony Smith、Alan M. Wachman 等人之研究。

¹²⁰ 如林立、許宗力、郭正亮、陳英鈴、游盈隆、黃昭元、廖福特、鄭永年、蘇永欽、J. F. Copper、Alan M. Watchman、Steven Philips、Robert P. Weller、Murray A. Rubinstein、Hungdha Chiu、Hermann Halbeisen 等人之研究。

¹²¹ 如吳泉源、吳能遠、郭俊次、郭洪紀、黃俊傑、葛永光、Sung-sheng Yvonne Chang、Edwin A. Winckler、Thomas B. Gold、Chu Ten 等人之研究。

灣就會與中國大陸切斷關係，而成就台灣的國家認同，事實上，不同的民族可建立一個或多個國家，相反的多個民族也可以建立一個或多個國家，所以以族群認同等同於國家認同的論述，確實有待商榷。

(二)、忽略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起始與結果，更是民族主義的核心因素，只將文化認同附屬於族群認同加以討論，多半無法明顯區別兩者的不同，甚至對於文化認同的探討付之闕如。

(三)、制度認同層面則著重在以法律面，尤其是依據憲法與國際法層面論述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與大陸不相隸屬，事實上，徒法不足以自行，憲法形式的呈現，或國際法上的定位，若無法獲得台灣民意的認同與支持，也將難以為繼，所以僅由法律層面論述台灣的國家認同顯有不足。

為改善這些論述的不周延，在台灣國家認同方面，本論文意圖同時以族群認同、制度認同及文化認同三個層面的探討來建構台灣的國家認同，且依據這三個層面認同的變化來呈現台灣國家認同的變化，並依據國家認同的變化觀測兩岸關係的轉變，再從中建立因果關係，以彌補現有兩岸關係理論的不足。

四、研究架構

本論文共分六章，約二十一萬餘字。

第一章：緒論，闡述本論文研究動機、目的及研究範圍與方法。

第二章：一個中國時期的國家認同，闡述兩蔣時代對於一個中國政策的堅持，並全力扭轉日治後的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觀念，並檢視其間所發展出來的兩岸關係。

第三章：本土化時期的國家認同，闡述李登輝主政時期，對於國家認同逐步由一個中國轉向特殊國與國關係，並發掘其中兩岸關係的轉變狀況。

第四章：政黨輪替迄今國家認同的變化，闡述代表台獨勢力的民進黨陳水扁政府繼任總統後，將台灣國家認同更向「一邊一國」方向推動，及所造成的兩岸關係結果。

第五章：國家認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統合由兩蔣經李登輝再到陳水扁時期，有關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及兩岸關係在質上的轉變情形，確認國家認同自兩岸關係轉變中的關鍵地位。

第六章：結論，歸納心得，並提出對於兩岸關係理論建構的建議。

